

说说两代多友

李金铨（香港城市大学）

一、中国大，圈子小

我在几个场合都劝年轻学子要广结善缘。中国虽大，我们的圈子很小，将来碰来碰去都是这批人。我敢这样说，因为这是“多闻雅集”的写照。以中国之大，以我系之小，到目前有 173 位多友（外加“多友之友”）能形成一个“无形的学府”——藏龙卧虎，完全自由出入，彼此推心置腹，丝毫没有利害的计较，这是何等殊胜的缘分。

现在全国各种会议遍地开花，但不论走到哪里必有“多友”的身影。原来不熟悉的，只要一说是“多友”，自然有一股凝聚的情愫；原来熟悉的更加变成好朋友了。“多闻雅集”的微信大群经常很热闹，即使互相调侃也有“多友爱”在里面。北京、上海、南京和武汉四地成立了分群，互通声息。还有各届多友自己成立小群，这些人有时候忙起来好像不要睡觉。如此这般，大气候包围中气候，中气候包围小气候。

“多友”办的会，总是请其他“多友”参加，也总是靠其他“多友”捧场。例如去年何晶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政治传播研究中心开幕而办会，多友们在微信群讨论，一个钟头内刘海龙就组织了一个强棒的 panel。北京多友大力支持不在话下，各地多友也都远道参加。书法家沈国麟多友还特地写了一幅墨宝当贺礼，录的是朱熹的两句话：“旧学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养转深沉”。今年张红忠在北师大每周举办研讨会，更是赠送福利给一批忠心耿耿的“多友们”。

最暖心的，莫过于南大多友成立“多闻学院”，还在四月中举办第一届“多友论坛”，邀请四十人参加。“烟雨三月下扬州”，李白说的是农历三月，正是我们聚会的阳历四月，大有“八方风雨会中州”之概。若干篇论文汇集在《新闻记者》刊出，成为“多闻论坛”的专辑。这次成都之会，我们分三组讨论教研面临的挑战，所讨论的也有普遍意义，希望编成专辑和学界

分享。我们实实在在是“以文会友”，既有“文”也有“友”，所以我形容多闻雅集是“invisible college of scholarship and friendship”。

“多闻雅集”俨然已成为中国传播学术界的中青年骨干了，然而每年想报名参加的很多。申请者多多益善，但必须要求他们谅解一件事：“如果没有选上，那是我们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。”我们毕竟能力有限，只能量力而为，考虑的因素又多，难免有向隅之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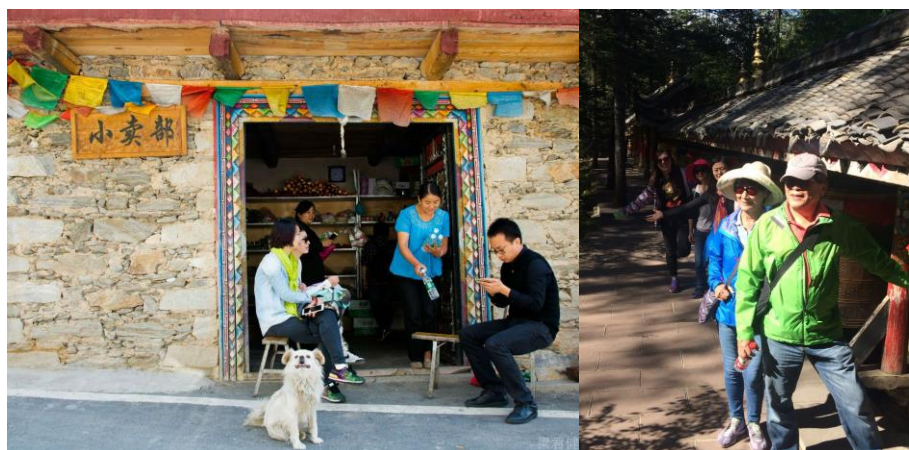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“多二代”

记得 1980 年代中叶以前，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学会 (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, 简称 AEJMC) 年会是轮流在大学校园召开的，大夥只能将就将就，住进学生宿舍里，气氛犹如家庭聚会一般简单而亲密。这些穷教授们纷纷驾车，装满一家大小，艰苦而浩荡地横跨新大陆，名曰开会，权充家庭度假。我刚到明大教书时，著名的新闻史学家爱默里 (Edwin Emery) 教授已经准备退休了。据他说，他们那一辈人的家庭定期在年会时节相聚，子女长大以后都自称是“AEJMC Babies”。后来该会规模愈滚愈大，只好转去大酒店豪华，也就抹杀这个优良的革命传统了。

现在轮到我们的“多二代”书写他们的历史与传说了。前年尹砺节小朋友（深圳）从兰州和敦煌回来以后，写了两篇很棒的作文，一诉说黄河母亲，二赞叹鸣沙山和莫高窟，其文字和想象力都令人击节。所谓“有为者亦若

是”，尹砺节无意中带活了“多二代”的文风。去年去内蒙，邓子豫（广州）、王开颜（南京）、汪思博（上海）和肖学而（深圳）各写一篇，各有各的精彩。端的是有怎样的父母，就有怎样的子女。我看着这些小文豪的文章，自觉汗颜，但更庆幸后生可畏。

今年从川西回来，邓子豫又拔了头筹，接着有王在在（杭州）、呼延同（西安）、程嘉沐（杭州）和王开颜接力。但愿这场接力还没有结束。“多二代”在书写他们宝贵的共同记忆，比“多一代”还积极。比起来，“多一代”的积极性实在有点“那个”。



三、兴风作浪

假如人人都像黄顺铭，多一代的积极性就不会太“那个”了。他号称“审美叛乱”，把红橙黄绿蓝靛紫都穿在身上，招蜂引蝶。没有他的叛乱，就不会请吴来安设计出别致的“多友衫”。没有“多友衫”，林芬攀登欧洲最高峰时衣服就必然大为失色。

没有黄顺铭的兴风作浪，成都多友会不会办得这么好。当然也是其他多友（曾雅妮、徐沛、加上刘娜）客气，纵容他任性撒野的。他的“流水帐”记得那么细，大概是穿衣服穿出灵感的。他自己写完“流水帐”，就搞出什么“冰桶挑战”，我躺着中枪，因此积极性也无法太“那个”了。

